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24.10.004

刘洋、李益斌：“‘全球南方’如何突破群体性崛起困境？——基于国际共生理论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分析”，《太平洋学报》，2024年第10期，第42-53页。

LIU Yang, LI Yibin, “How Can the Global South Overcome 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Rise?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Symbiosis Theory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acific Journal*, Vol.32, No.10, 2024, pp.42-53.

“全球南方”如何突破群体性崛起困境？

——基于国际共生理论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分析

刘洋¹ 李益斌¹

(1.兰州大学,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 伴随“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态势持续增强,其面临的困境愈发凸显,具体表现为理论困境、制度困境与发展困境。理论困境导致“全球南方”问题研究缺乏本土视角,群体性崛起的合法性难以得到认同;制度困境导致“全球南方”的国际制度性权力薄弱,国际影响力难以有效发挥;发展困境导致“全球南方”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的中低端,发展潜力难以充分激活。理论层面的“西方迷思”与现实层面的“内外交困”是“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困境形成与加深的主要原因。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既有意愿也有能力助力“全球南方”突破相应困境。理论上,中国学派的国际共生理论有助于破解强调“对抗冲突”的“西方迷思”,强化“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合法性认同,推动实现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践上,“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有效提升“全球南方”的制度性权力,充分激活“全球南方”的经济发展活力,助力其实现发展战略自主、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并平等享受发展成果。当然,国际共生理论与“一带一路”倡议应用于“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尚处于探索阶段,深层融合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打磨和完善。

关键词: “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困境;国际共生理论;“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049(2024)10-0042-1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之下,“全球南方”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2023年7月25日,王毅外长出席第十三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

时指出,“‘全球南方’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大集体,体现了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群体性崛起。”^①2023年8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

收稿日期:2024-04-23;修订日期:2024-08-24。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大数据驱动的未来十年中国周边恐怖主义风险及应对研究”(22CGJ001)的阶段性成果;且得到2024年度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印度‘全球南方’战略及对中印关系的影响”(2024lzujbkyqm001)的资助。

作者简介: 刘洋(1991—),女,湖南邵阳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一带一路”与中国对外关系;李益斌(1990—),男,山西运城人,兰州大学印度研究中心、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一带一路”与国家安全。

* 感谢《太平洋学报》编辑部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① “王毅出席第十三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3年7月25日,https://www.fmprc.gov.cn/wjdt_674879/gjldrh_674881/202307/t20230725_11117690.shtml。

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致辞中强调，“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版图。”^①政治影响力的上升、经济实力的增长及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度变革，推动“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世界格局呈现更明显的多极化态势。政治上，“全球南方”成为影响国际政治格局调整与重塑的关键力量；经济上，“全球南方”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占比不断上升，为破解世界经济难题做出巨大贡献。虽然“全球南方”作为一种整体性力量的崛起态势在增强，推动构建公正合理、平等有序的多极化世界秩序的意愿在加深，但西方为维护霸权秩序，对于“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威胁”认知也在不断强化，由此带来的崛起困境不断加深。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的当下，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如何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助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和迫切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尝试结合国际共生理论与“一带一路”实践，探讨“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困境这一重要命题，这也是当前学术界尚未全面展开分析的一个方向。

一、“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三重困境

“全球南方”的兴起有其历史渊源与现实基础。从资本主义和西方价值观扩张的视角来看，“全球南方”指的是经济逐步发展起来并从非民主政权中“解放”出来的地方；从新兴政治社会的视角来看，指的是那些脱离西方民主话语束缚的地方。^②与“第三世界”“贫穷世界”“欠发达地区”等概念相比，“全球南方”更为中性，政治上谋求独立自主、经济上追求发展振兴、秩序上强调公道正义，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共性。伴随当代世界资本主义陷入深度发展危机，其破坏性后果在“全球南方”中体现得最为明显。^③当前，国际秩序变乱交织，“全球南方”国家深受其苦，对独立自主、发展振兴、公平正义的共同追求更加强烈。正因如此，以中国为

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反对殖民主义、霸权政治的诉求不断凸显，并以改变现有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为目标。^④然而，西方集团对霸权秩序的护持决心与“全球南方”期待变革的愿景同样强烈。因此，虽然“全球南方”的整体性崛起态势在持续增强，但也面临来自西方霸权秩序的巨大阻力。结合历史与现实，本文将“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困境概括为理论困境、制度困境与发展困境。

1.1 理论困境

理论困境主要体现为“南北”理论发展的严重失衡。具体来看，这种理论失衡涵盖了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发展理论以及国际文化理论等多个维度。以国际关系理论为例，当前关于“全球南方”的研究主要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为视角，本土理论则被边缘化。考察国际关系理论在全球范围内输入与输出的过程可知，“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知识传递进程中存在经济性、社会性和制度性不公。“全球北方”国家的学者抢先界定了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范畴，导致“全球南方”国家的学者大多只能消化、吸收，而非创造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久而久之，“‘全球南方’国家无法进行理论原创的偏见就此形成”，诸多“全球南方”国家的声音被忽视，基于本土政治与经济实践的实践经验难以在理论研究中得到体现。比如，中东和拉美的现实主义流派产生时间早于新古典现实主义，且注重将研究范式与本土经验紧密结合，解释力亦有所提升，但这些理论流派却没能走出它

① “习近平在2023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闭幕式上的致辞（全文）”，新华网，2023年8月23日，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3-08/23/c_1129817742.htm。

② Walter D. Mignolo, “The Global South and World Disorder”,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Vol.67, No.2, 2011, pp. 165-188.

③ Kaveh Yazdani and Constanza Castro, “Capitalisms of the ‘Global South’ (c. 10th to 19th Centuries) – Old and New Contributions and Debates”, *Historia Crítica*, No.89, 2023, pp.3-4.

④ 吴志成：“‘全球南方’的兴起与中国的立场担当”，《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23期，第13页。

们的原产地。^① 同样地,“南北”失衡在国际发展理论方面亦有所体现。以现代化模式为例,凭借现代化发端于西方社会这一历史事实,西方理论界长久把持着现代化的解释权,将现代性等同于西方现代性。^② 事实上,西方现代化是一种将自身特殊性附魅为世界普遍性的发展模式,其实质是打造和维系以“中心—边缘”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全球剥削体系。^③ 而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众多后发民族现代化的重要代表,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之路确立了信心,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在更高阶段上深化、丰富并创新了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然而,美国为进行霸权护持,遏制围堵中国,不断渲染中美国际发展政策的差异,并将这种差异解读为“美国模式”与“中国模式”的分歧,甚至上升为“民主”与“专制”的对立。^④

理论的发展需要顺应现实的变化,“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现实需要相应的理论关照。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政治影响力的上升,“全球南方”正在超越地理和地缘政治范畴,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关键力量。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4年和2025年,发达经济体的全球经济增长速分别为1.5%和1.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为4.1%和4.2%。^⑤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23年金砖国家在全球GDP的份额达到创纪录的35.7%,而七国集团经济体的比重降至29%。^⑥ 自2022年至2025年,“全球南方”国家连续四年担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分别是2022年的印度尼西亚、2023年的印度、2024年的巴西和2025年的南非。与“全球南方”在经济与政治领域不断上升的影响力相比,理论研究的进展却较为缓慢。有观点指出,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城市化的重心正在从北半球转移至南半球,相关理论也需调整以适应这一转变。^⑦ 总之,当前“南北”理论发展失衡的现象值得高度重视。这不仅影响相关理论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更关乎“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能否得到合法性认同,从而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秩序。

1.2 制度困境

制度困境主要体现为“南北”国际制度性权力的严重失衡。国际制度性权力是指在规范、规则和组织的形成、存续和变迁过程中,行为体依据其实力和意愿,影响国际社会其他行为体的认识和行为的能力。^⑧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制度性权力并非自发生成,其获得取决于国家行为体与既有国际制度的互动。然而,现代国际秩序由西方缔造和维护,在这种国际秩序之下,“全球南方”虽然获得了独立,但殖民主义的影响一直存在,“全球南方”国家依旧受到不公正、不公平的对待。^⑨ 无论是国际制度互动,还是对国际议程、问题或政策行动的影响力,“全球南方”国家仍处于弱势地位。有观点指出,“全球南方”这一术语事实上标志着世界上的下层人民相互承认其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世界边缘的共同处境。^⑩ 因此,虽然“全球南方”国家对改变自身处境的愿望非常强烈,期待获得相应的国际制度性权力,但西方霸权护持的决心,势

① Lúiza Cerioli, “Neoclassical Realism,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Unheard Echoes of Realist Practices from the South”,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 2024, <https://doi.org/10.1177/13691481241230858>.

② 李志、黄曼:“西方现代性的质询与现代化的中国式探索”,《理论探索》,2023年第6期,第5页。

③ 孟庆龙:“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化=西方化’迷思的祛魅与超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4年第6期,第101页。

④ 罗建波、李伊:“美国加强对华国际发展援助竞争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太平洋学报》,2024年第5期,第66页。

⑤ “全球增长面临的风险大致平衡,经济有可能实现‘软着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4年1月30日,<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Issues/2024/01/30/world-economic-outlook-update-january-2024>。

⑥ “金砖国家在全球GDP中的份额达到创纪录的35.7%”,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024年7月3日,<https://sputniknews.cn/20240703/1060194151.html>。

⑦ Susan Parnell and Jennifer Robinson, “(Re) theorizing Cities from the Global South: Looking beyond Neoliberalism”, *Urban Geography*, Vol.33, No.4, 2012, pp.593-617.

⑧ 张发林:“国际制度性权力的生成及其实践”,《太平洋学报》,2022年第11期,第3页。

⑨ 王明进:“‘全球南方’与国际秩序转型”,《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23期,第52页。

⑩ Alfred J. Lopez, “Introduction. The (Post) Global South”, *The Global South*, Vol.1, No.1, 2007, pp.1-11.

必使“全球南方”变革世界秩序的进程面临诸多障碍。

基于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牢牢掌控着国际制度的规则制定权、资源分配权和国际话语权,其遏制“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动力,也正是“全球南方”崛起于霸权秩序的阻力。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兴起,“全球南方”对自主平等的诉求与“全球北方”的霸权护持形成历史性拉扯与震荡。^①虽然“全球南方”的经济体量较大,经济增速较快,但在主要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性不足,导致制度困境愈发凸显。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UNCTAD)秘书长丽贝卡·格林斯潘(Rebeca Grynspan)强调,与六十年前相比,尽管现在的“全球南方”约占世界经济产出的58%,南南贸易约占所有贸易的三分之一,贫困和人类发展指数不断改善,但在最重要的指标上仍然落后,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和投票权为例,发达经济体仅占世界人口13.6%,但拥有59.1%的选票;发展中国家拥有世界86.4%的人口,创造了58%的GDP,却只拥有41%的投票权,中国的GDP约占全球经济的18%,但仅享有6%的投票权。^②由此可见,既有国际制度的结构性不平等阻碍了“全球南方”的发展,部分机制设置并不能公正地反映各国共同利益,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合理关切。总之,“全球南方”尚未获得与其经济实力及世界发展贡献率相匹配的国际制度性权力,相应的国际议程设置能力与规范塑造能力等亦受到掣肘,变革世界秩序的影响力难以有效发挥。

1.3 发展困境

发展困境主要体现为“南北”之间持续扩大的发展鸿沟。当今世界面临最突出的不平等,就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平等。西方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分工中占据高端生产环节,将低端生产工序和环节转移到“全球南方”国家,造成其长期落后。^③2013年7月8日至10日,厄瓜多尔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与南方中心(South Centre)组织了一场关于全球价值链(GVC)的讨论会。厄瓜多尔大使米格尔·

卡博·贝尼特斯(Miguel Carbo Benites)在开幕致辞中强调,“全球价值链往往会深化传统的国际分工模式,跨国公司为实现高效运作,选择在原材料或中间产品的原产国进行生产,但这种结构可能会损害各国相应的主权利益,欠发达国家难以从中获益。”^④以数字技术为例,现有的国际制度环境确立了数据等无形资产的强排他性,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能够垄断无形资产,获得相对于南方国家企业与政府的不对称权力,“全球南方”国家则长期困于附加值的最低层。^⑤总之,收益分配不对称地偏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高端工序则由具有显著优势的发达国家所控制,导致南北国家间的贫富差距持续性扩大。

此外,在气候治理领域,发达国家作为全球变暖的始作俑者,理应承担气候治理的领导责任,却习惯性地批评发展中国家,并刻意忽略这些国家在减排和能源转型过程中的实际困难,进一步加剧了南北发展鸿沟。事实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全球南方”国家不仅不是气候破坏的实施者,反而是气候危机的重要受害者。研究显示,全球约90%的过量碳排放源自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美国、澳大利亚等高收入国家,即使是收入水平最低的10%的个人,其碳排放量也是印度、巴西或东盟地区最贫困的10%的个人碳排放量的6至15倍。^⑥令人担忧的是,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2023年适应差距报告》,目前发达国家筹集的气候适应投资仅为

① 殷之光:“‘全球南方’与新型全球化”,《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23期,第35-49页。

② “Statement by Rebeca Grynspan, Secretary - General of UNCTAD, Third South Summit”, January 22, 2024, <https://unctad.org/osgstatement/third-south-summit>.

③ 王明国:“从边缘性反抗到结构性重塑:‘全球南方’与国际秩序转型”,《太平洋学报》,2024年第5期,第21页。

④ Kinda Mohamadieh, “Global Value Chains: Unpacking the Issues of Concern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February 4, 2014, <https://www.southcentre.int/question/global-value-chains-unpacking-the-issues-of-concern-for-developing-countries/>.

⑤ 秦北辰:“数字技术、权力失衡与全球南方产业发展的困境”,《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4年第3期,第80页。

⑥ “在气候问题上失信于全球南方 发达国家加剧全球分歧”,新华网,2024年2月28日, <http://www.news.cn/20240218/a6314e9eee07449eb6d1be57a2627e59/c.html>.

发展中国家所需的 1/18 到 1/10, 资金缺口巨大, 项目规划和实施几乎处于停滞状态。^① 总之, 为了固化发达国家的发展优势, 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基于规则”始终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规则”, 等级制与圈层化特征明显, 导致“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结构性差距难以跨越。

由此可见, 虽然“全球南方”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整体影响力不断上升, 但理论困境、制度困境与发展困境相互交织、相互作用, 群体性崛起受到结构性制约。为构建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的多极化世界秩序, 有必要深度剖析“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困境的成因并探索相应的破解路径。

二、“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困境的产生

“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为何面临理论、制度与发展困境? 明确相关成因有助于更好地助力其群体性崛起。究其实质, 理念驱动现实, 现实强化理念。基于此, 下文尝试结合困境的具体表现, 从理论与现实两大层面对“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困境的成因进行剖析。

2.1 理论层面的“西方迷思”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本质是为霸权秩序提供合法性支撑, 强调区分“自我”与“他者”, 重在凸显“对抗”与“冲突”, 难以构建和平共处乃至和谐共生的国际秩序。“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现实在这一“西方迷思”下, 不仅难以获得相应的理论关照, 其合法性认同也会被严重削弱。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 并不意味着殖民主义造成的不公已经消失。相反, 美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霸权, 使其在关键概念与原则的定义权与解释权方面占据绝对优势。比如如何界定最紧迫的威胁, 以及西方国家在启动“保护的责任”这一原则方面所具有的较大影响力。^② 此外, 以朝鲜核问题为例, 有观点认为, “如果朝鲜无权拥有核武器, 那美国和中国就应该保护朝鲜的安全, 换来它的去

核化, 这才是以身作则和公平, 只有西方国家会在没有考虑公平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就要求制裁, 事实上世界上 195 个国家里, 西方国家只占了大约 20%。”^③ 同样地, 乌克兰危机的延宕和巴以问题的升级, 与美西方集团的“拱火浇油”和“双标”立场密切相关。西方并不能站在中立的视角促进问题的解决, 而中国提出的和平解决方案却屡遭西方抨击, 并被刻意塑造为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挑战。

事实上,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思考的历史资源, 过多地来源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及西方近代以来频繁的内部战争经验。^④ 这与“全球南方”对和平与发展的强烈诉求并不匹配。作为当今世界秩序的缔造者和主要受益人, 西方将“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视为“自由国际秩序”的“威胁”。因此, 当“全球南方”的自主意识开始觉醒, 变革霸权秩序的愿望愈发强烈并开始追求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时, 西方的“对抗性”思维愈发凸显, 蔑视、质疑和否认“他者”的行为剧增。美西方对中国的遏制打压以及污名化就是这一思维的直接体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对抗冲突”内核, 难以容忍任何企图变革霸权秩序的力量。为维护霸权秩序, 霸权国不断强化这种近乎偏执的“威胁”认知, 借助经济、科技、军事、盟伴网络等多种力量对崛起国进行遏制, 战略偏好愈发极端, 安全困境持续加深。基于此, 在当前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视域下, “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不仅难以得到合法性认同, 还会被视为动摇霸权秩序的“威胁”, 崛起进程中面临的阻力持续加大。

① “2023 年适应差距报告”,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23 年 11 月 2 日, <https://www.unep.org/zh-hans/resources/2023nianshiyingchajubaogao>。

② François Polet, “Revisiting the North-South View of the World”, December 16, 2020, <https://www.oxfordomnia.org/2020/12/16/north-south-polet/>。

③ 阎学通、张琪著:《道义现实主义与中国的崛起战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7 页。

④ 袁胜育:“共生型国际体系:理论与挑战”,《社会科学》, 2014 年第 6 期, 第 14 页。

2.2 现实层面的“内外交困”

从内因来看,内生动力不足造成“全球南方”的整体发展受限。发展是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关键,基础设施薄弱是制约“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主要瓶颈。虽然以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大进步,但总体来看,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仍然存在收入较低、贫困程度较高、人口稠密、教育机会有限和卫生系统不完善等现象,造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基础设施薄弱。^①然而,由于投资大、风险高且回收期长,西方集团主导的许多私营跨国企业投资意愿日渐低迷,“全球南方”国家的基建需求始终面临巨大资金缺口。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终实现有赖于优质基础设施的提供,但基础设施的投资远远不足。根据二十国集团2017年发布的《全球基础设施展望》报告显示,2040年全球基础设施投资缺口将达到97万亿美元。^②更严重的是,近年来新冠疫情的冲击、乌克兰危机的延宕和巴以冲突的升级,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基建融资的倒退,长期投资更加匮乏。

从外因来看,西方势力的分化与拉拢加剧了“全球南方”的身份认同危机,整体凝聚力被削弱。“全球南方”囊括国家众多,异质性较突出,内生凝聚力有限,容易因外部冲击而产生分歧。鉴于“全球南方”国家正在成为塑造世界秩序走向的关键力量,为进行霸权护持,西方开始加速对相关国家的分化和争夺。一方面,展开声势浩大的“全球南方”外交攻势,争夺这些国家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支持。欧盟委员会前副主席凯瑟琳·阿什顿(Catherine Ashton)认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中“全球南方”的态度表明,西方需要重新思考那些理所当然的关系,尊重南方国家日益上升的地位以及不断增长的自主性。^③2023年2月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创纪录地邀请众多“全球南方”国家代表参会,并设置“南北合作”专场讨论,强调西方要争取“全球南方”。^④2023年5月,日本作为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主张加强与“全球南方”的关系。^⑤另一

方面,企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南方”范围之外,并鼓动印度与中国展开所谓的“全球南方”领导权之争。比如,美国试图在增进与“全球南方”关系的同时,致力于把“全球南方”打造为推进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方向,在中国与“全球南方”之间进行区隔,防止中国主导“全球南方”,打击中国与其他南方国家联合自强的努力。^⑥为否认中国的“全球南方”身份,还有学者将世界划分为“全球西方”“全球东方”和“全球南方”,其中“全球西方”由美欧领导,“全球东方”由中俄领导,“全球南方”则由发展中国家群体组成,还未形成明确领导者。^⑦西方排斥中国并鼓动印度开展所谓“龙象之争”的核心意图,在于分化“全球南方”的整体性,并弱化这一概念下的集体身份认知。印度对此表现出高度配合的意愿,将自身定位为“全球南方”的“代言人”和“领导者”,以及连接“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桥梁,试图削弱中国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并深化印美关系。^⑧基于此,需警惕西方利用印度追求大国地位的急切心理,操弄“全球南方”议程,激化中印竞争,加剧“全球南方”陷入

^① Kevin Gray and Barry K. Gills,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7, No. 4, 2016, pp. 557-574.

^② “Global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need to Reach USD97 Trillion by 2040”, Global Infrastructure Hub, July 25, 2017, <https://www.gihub.org/media/global-infrastructure-investment-need-to-reach-usd97-trillion-by-2040/>.

^③ Baroness Ashton, “Stop Taking the Global South for Granted”, Chatham House, February 2, 2024, <https://www.chatham-house.org/publications/the-world-today/2024-02/stop-taking-global-south-granted>.

^④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2023, Dig Watch, February 17 to 19, 2023, <https://dig.watch/event/munich-security-conference-2023>.

^⑤ Sakura Murakami and Andreas Rinke, “At G7, Japan and Germany Want a Rethink on the ‘Global South’”, Reuters, May 20, 2023, <https://www.reuters.com/world/g7-japan-germany-want-rethink-global-south-2023-05-20/>.

^⑥ 门洪华:“‘全球南方’的兴起与国际博弈的新图景——兼论中国的战略应对”,《教学与研究》,2024年第1期,第110页。

^⑦ G John Ikenberry, “Three Worlds: the West, East and South and the Competition to Shape Glob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0, No. 1, 2024, pp. 121-138.

^⑧ 张杰:“印度强化与‘全球南方’关系:战略雄心与制约”,《国际问题研究》,2024年第1期,第91页。

集团政治困境的风险。^①

综上所述,“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之所以面临理论、制度与发展的三重困境,主要在于理论层面的“西方迷思”与现实层面的“内外交困”。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削弱了“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合法性认同,固化了其在霸权秩序中的不利处境;现实层面“全球南方”面临的内外因素则进一步限制了整体发展的活力,集体身份认同与集体行动能力均受到影响,导致群体性崛起进程受阻。

三、“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 困境的破解

尽管“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势头强劲,但由于理论与现实的掣肘,其所面临的多重困境仍不容小觑。当前国际秩序进入深度调整期,“全球南方”能否顺利实现群体性崛起意义重大。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和推动构建新型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能够为助力其突破相应困境提供路径选择。在理论层面,中国学派的国际共生理论有助于破解“西方迷思”,丰富源自“全球南方”本土实践经验的理论视角,从共生主体、共生纽带与共生底线三个环节强化“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合法性认同;在实践层面,“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全球南方”获得国际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平台,也充分激活了“全球南方”的经济发展活力,助力其实现发展战略自主、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以及平等享受发展成果。

3.1 理论工具:国际共生理论

国际共生理论强调以“和合共生”替代“对抗冲突”,能够为“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提供有别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合法性认同基础。国际共生理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顺应了中国和平与发展的实践理念,对于发展新型国际关系、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建设共生互利型国际秩序、改善国际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②与西方主流国际关

系理论强调“对抗冲突”的取向不同,国际共生理论极具包容性,它肯定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并认为差异性是推动事物建设性发展的活力来源。这样一种兼收并蓄、包容万物的理论学说在变乱交织的当下具有更突出的时代意义。国际社会共生性的实现涉及四大基本要素,即共生关系的主体、共生关系的纽带、共生关系的底线以及共生关系的拘束性。^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共生性底线与拘束性存在一定重合,均秉持克制自我、包容他人的理念。结合国际共生理论的基本要素与本文的研究对象,本文认为,共生理论主要从共生主体、共生纽带以及共生底线三个环节为“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提供了相应助力。

(1) 共生主体:以平等有序的多极秩序取代等级制的霸权秩序

共生的核心主体是国家。尽管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日渐上升,但国家的主体地位仍未动摇。“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驱动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走向多极化,重塑当前国际秩序的意愿愈发强烈。为缓解压力,霸权国有意忽视新兴经济体为国际发展做出的贡献,引导人们将注意力放在新兴国家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挑战上,自身却在应对新兴国家和平崛起的进程中,做出诸多不负责任、威胁国际和平的行为。^④归根结底,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单向度思维固化了“对抗与冲突”的核心概念,若某一非西方文明准备复兴就带有“原罪”,构成了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与西方文明产生了“冲突”,西方文明需要对其采取全面压制。^⑤

^① 吴琳:“大国身份叙事重塑与印度的新‘全球南方’外交”,《太平洋学报》,2023年第11期,第1页。

^② 任晓、门洪华、刘雪莲等:“国际共生理论的理论贡献、现实回应和未来展望”,《国际观察》,2023年第6期,第59-62页。

^③ 金应忠:“国际社会的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第12页。

^④ 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第5页。

^⑤ 邢广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的国际视野——以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为视点”,《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年第5期,第22页。

西方对外关系的基本哲学框架和逻辑体系也明显受到西方“文明冲突论”的影响。基于此,西方集团不断强化对“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威胁”认知,将中国等“全球南方”大国塑造为国际秩序的“修正者”,强化阵营对抗,阻挠国际制度改革。究其实质,是西方无法容忍所谓的“他者”动摇霸权秩序。国际共生理论强调的是所有共生主体之间的平等,这种共生既包括“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共生,更包括“南北”之间的共生,强调的是求同存异,最终目标是构建从和平共处到和谐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共生纽带:以互利共赢的多边主义取代“脱钩断链”的少边主义

共生关系的纽带是资源。资源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能产生某些效能以满足人之需要者,包括物质系列、精神系列、劳务系列、关系系列等内容”。^① 人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各种各样的资源,以人为基石的国家为实现发展振兴,对资源亦具有迫切需求。历史上的殖民主义与现实中的结构性不平等,导致“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之间的发展权利严重失衡。伴随“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全球经济重心的“南移”,西方集体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愈发注重强化“脱钩断链”,构筑“小院高墙”,意图固化“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的中低端位置。部分发达国家为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将资源投入无休止的军备竞赛中,严重拖累了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事实上,共生主体围绕资源既存在斗争,也存在妥协。如何平衡这种斗争与妥协,决定了国际社会和平与战争的不同样态。对于具有相对稀缺性的资源,更需要依赖不同主体之间协调合作,才能有效满足共生性需求,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当今世界存在巨大的全球治理赤字,诸多全球性问题亟须世界各国采取集体行动加以应对。然而,西方“自由国际秩序”不仅难以照顾“全球南方”的利益关切,甚至以安全逻辑压倒经济逻辑,构筑“小院高墙”扰乱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阻碍世界经济健康发展,“全球南方”深受其苦。对于追求和平与

发展的“全球南方”而言,只有坚持互利共赢的多边主义,取代“脱钩断链”的少边主义,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激活自身的发展潜力,为其群体性崛起进程增强动力,而非增加阻力。

(3) 共生底线:以相互尊重的独立自主取代肆意干涉的霸权政治

共生关系的底线是相互克制。能否尊重别国生存发展、国际社会共生的底线,是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面临的基本问题。^② “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强化了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诉求,希望选择符合自身发展道路且不被肆意干涉。事实上,“全球南方”地域范围宽广、国家和地区众多,各国发展水平不等,发展和安全所面临的问题各异。^③ 在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全球南方”与主要发达国家存在的不对称依赖关系,导致其发展的脆弱性愈发突出。西方发展援助的知识体系,高度重视对援助附加条件的强调以及援助项目设计中的逻辑框架,认为援助应该按标准倾向于投放给那些遵从民主善治等制度改革的国家,抑或是援助项目中通过一系列事先严格设计好的指标和活动来推动受援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④ 可以说,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政治色彩相当浓厚。此外,对于那些不符合西方设定的“民主”“人权”标准的发展中国家,动辄实施单边乃至多边制裁,抑或是扶持代理人战争,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左右其外交决策,加剧国际社会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与之相比,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西方对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垄断,给“全球南方”树立了自主发

① 胡守钧:“国际共生论”,《国际观察》,2012年第4期,第35页。

② 金应忠:“共生性国际社会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国际观察》,2012年第4期,第48页。

③ 门洪华:“‘全球南方’的兴起与国际博弈的新图景——兼论中国的战略应对”,《教学与研究》,2024年第1期,第108页。

④ 徐秀丽、李小云:“平行经验分享:中国对非援助理论的探索性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1期,第120页。

展的典范。^① 全球共生关系的优化应当遵循克制包容的底线,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应相互克制、相互包容。

从共生主体、共生纽带到共生底线,中国学派的国际共生理论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提供了有别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全新视角。不论是在情感共鸣上还是在利益分配上,国际共生理论都更能满足“全球南方”的发展需求。客观来说,全球共生的主体包括“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秉持“和合共生”的国际共生理论,力图破解的就是多元世界中不同国家的共处之道难题。它提出了一种契合全球化进程的世界秩序方案,能够和谐地容纳多元力量与价值,迈向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国际共生理论不仅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全球南方”视角,更为“全球南方”突破群体性崛起困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3.2 实践路径:“一带一路”倡议

国际共生理论有助于强化“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合法性认同,旨在实现新型经济全球化的“一带一路”倡议,则有助于“全球南方”提升国际制度性权力,并充分激活其经济发展动力,为突破制度困境与发展困境提供切实有效的实践平台。

(1) 提升“全球南方”的国际制度性权力

国际制度性权力可以通过创建、参与、改革、推出和破坏的方式来获得。^②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余年来,实现了“从愿景到现实”的转变。它作为中国倡导的多边合作框架,旨在从宏观上协调各国之间的合作,涵盖了政治、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多个问题领域,因此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根本制度。^③ 鉴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制度属性,在此框架下开展的国际合作,可以视为“全球南方”国家通过主动创建的方式获取国际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实践。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与民心相通,“一带一路”促使共建国在政策、设施、贸易、资金乃至民心上产生更加紧密的连接,成为中国与共建国携手发

展的合作之路、机遇之路、繁荣之路。作为中国对外政治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与不同制度之间的“对接”更是一种全新的国际制度互动方式。^④ 相关国家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具体目标 and 责任义务达成共识,通过“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合作实现与既有国际制度的良性互动。这种互动大幅提升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经济发展合作领域中的影响力,国际制度性权力也得以增强。

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这是继“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中国提出的又一重大倡议,亦可以回答“全球南方”需要何种发展理念、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时代之问。全球发展倡议进一步回应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经济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强烈愿望和迫切需求,着眼破解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为推动世界以合作促发展指明了方向。“一带一路”倡议是全球发展倡议制度建设的核心路径,与此同时,制度建设也将是“一带一路”今后推动的重点,包括深化合作的内生制度和外部合作的对接制度。^⑤ 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落实,有助于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进一步增强“全球南方”在国际议程设置与国际规范塑造方面的影响力。

虽然当前国际制度本质上仍由美西方势力主导,但伴随霸权国际秩序的衰落与“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态势的上升,既有国际制度赤字愈发凸显,其合法性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这将成为“全球南方”国家获得国际制度性权力

① “南方觉醒 | 从全球南方崛起看国际格局演变”,新华网,2024年1月8日, <http://www.news.cn/silkroad/20240108/8fa82b91f302491a80c6b84ba3da1836/c.html>。

② 张发林:“国际制度性权力的生成及其实践”,《太平洋学报》,2022年第11期,第1页。

③ 赵洋:“中美制度竞争分析——以‘一带一路’为例”,《当代亚太》,2016年第2期,第34页。

④ 崔守军、王妃:“制度复杂性与‘一带一路’国际制度对接研究”,《教学与研究》,2024年第3期,第90页。

⑤ 王明国:“全球发展倡议的国际制度基础”,《太平洋学报》,2022年第9期,第35页。

的历史契机。“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项目将推动沿线各国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间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全球南方”的天然同盟军,而“全球南方”国家又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共建国。鉴于此,“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共建,将进一步夯实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基础,拓宽其获得国际制度性权力的路径,助力突破相应的制度困境。

(2) 激活“全球南方”的经济发展动力

对“全球南方”而言,发展不仅是实现群体性崛起的关键,也是其始终追求的目标。正因如此,旨在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南方”的发展诉求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也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力量。具体来看,共商原则有助于“全球南方”实现发展战略自主;共建原则有助于“全球南方”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共享原则有助于“全球南方”平等享受发展成果。

第一,共商原则助力“全球南方”自主选择发展战略。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是实现国际社会和谐共生的前提。在突破传统“援助国—受援国”模式基础上,“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了一种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新型发展合作模式。共商原则充分尊重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差异,保障参与主体的自愿性、平等性和广泛性,在相关合作中不附带任何政治或经济条件,从而确保“共生”主体的舒适度、满意度和共识度。与西方极力构筑的“小院高墙”和“脱钩断链”迥异,开放包容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特征。11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从亚欧大陆延伸至非洲、拉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举办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立了20多个专业领域多边合作平台。^①其中亦包括新西兰、泰国、葡萄牙等数十个美国盟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战略对接与政策协调,中国式现

代化理念与实践得以广泛传播,为“全球南方”国家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土耳其外交政策研究所安全与战略研究主任哈桑·于克塞伦(Hasan Yükselen)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面向所有国家的开放项目,没有任何限制和条件,包容而非排斥使该倡议具有重要意义。^②总之,“一带一路”秉持的共商原则,旨在以合作共识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和社会制度差异,对所有共建国家予以充分的尊重,这也为“全球南方”自主选择发展战略拓宽了空间。

第二,共建原则助力“全球南方”增强自主发展能力。自主发展能力是“全球南方”突破群体性崛起困境的基石。共同发展是“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基础,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目标。受制于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发展滞后、工业化程度低、资金和技术缺乏、人才储备不足等因素,这些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产业链与价值链中的不利处境难以改变,资源潜力未能充分发挥。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了均衡型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的形成,改善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生产网络和财富分配中的地位,促进了结构性权力在共建国之间的扩散和转移。^③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结合自身优势,因应“全球南方”国家的不同现实需求,实现优势互补、联动发展,为这些国家平等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地位提供了历史契机,提供了诸如亚投行、丝路基金等重要的金融公共产品。针对气候治理问题,中国与非洲开展新能源合作,利用中国光伏产业优势,结合非洲农业、供水等领域的用能需求,实施“非洲光带”项目,以可持续的方式为非洲国家创造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

^① 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课题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成就”,新华社研究院,2024年4月30日。

^② “百年变局下的中国外交|他们用三个关键词告诉你‘一带一路’意味着什么”,新华网,2024年2月19日,<http://www.news.cn/silkroad/20240219/0e29a0e6fa324c9b909543d0860f0875/c.html>。

^③ 梁昊光:“‘一带一路’与新型全球治理: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太平洋学报》,2024年第1期,第17页。

实现“一带一路”的绿色发展。^① 中欧班列、雅万高铁、中老铁路等“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的落地,不仅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水平,更能可持续地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实现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的突破。

第三,共享原则助力“全球南方”平等享受发展成果。平等享受发展成果是国际社会和谐共生的目标。“一带一路”的共享原则能够助力现代化成果惠及“全球南方”,强化集体身份认同与集体行动能力。西方集团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并未实现普惠发展,结构性不平等导致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多数“全球南方”国家难以进入现代化轨道。虽然中国和印度等人口大国的崛起使得“中间”阶层的收入有所增加,全球不平等似乎有所减少,但由于造成这种不平等的系统性过程仍在持续,故导致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基本过程仍未改变。^② 而“一带一路”的共享原则在于实现公正合理的新型全球化,使发展既充分又平衡,保障“全球南方”国家能够切实享受到现代化发展带来的利好。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有史以来全球规模最大、共同收益最多的国际公共产品。据统计,“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若全部得以实施,到2030年,每年将有望为全球产生1.6万亿美元收益,占全球GDP的1.3%,其中90%由伙伴国分享,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受益更多,并有望帮助全球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③ 听其言而观其行,通过切实保障现代化成果惠及“全球南方”国家,“一带一路”不仅有效激活了这些国家的发展动力,也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了更多稳定性与确定性。

四、结 语

在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进行深度调整,而新秩序尚未完全形成之际,迈入群体性崛起进程的“全球南方”国家已然成为推动世界政治经济变革的关键力量。正因如此,其群体性崛起

面临的理论困境、制度困境与发展困境也愈发凸显。理论困境造成“全球南方”本土研究视角缺位,“西方迷思”丛生;制度困境造成“全球南方”国家的国际制度性权力薄弱,国际影响力难以有效发挥;发展困境造成“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结构性差距持续扩大,难以顺利进入现代化发展轨道。究其根源,理论研究的僵化与现实层面的内外因交织,造成相关困境的产生与加深。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既有能力也有意愿为助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提供中国方案。源自中国的国际共生理论与“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驱动力。理论层面上,从共生主体、共生纽带到共生底线,国际共生理论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提供了有别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全新视角。实践层面上,“一带一路”倡议既能有效提升“全球南方”的国际制度性权力,又能充分激活“全球南方”的发展动力。当然,国际共生理论与“一带一路”倡议应用于“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这一新叙事尚处于初期阶段,深度融合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打磨和完善。如何更好地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对话,使其更客观理性地认识“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现实,以及如何妥善处理“全球南方”内部的分化危机,强化集体身份认同,形成发展合力,都是今后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重要主题。

责任编辑 邵雯婧

^① “综述:中非新能源合作让更多‘小而美’项目惠及非洲”,新华网,2023年12月9日,http://www.news.cn/silkroad/2023-12/09/c_1130017796.htm。

^② Jayati Ghosh, “A Brave New World, or the Same Old Story with New Character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50, No. 2, 2019, pp. 379-393.

^③ “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新华网,2023年10月10日,http://www.news.cn/silkroad/2023-10/10/c_1129907870.htm。

How Can the Global South Overcome 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Rise?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Symbiosis Theory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LIU Yang¹ LI Yibin¹

(1.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As the collectiv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emerges, it faces theoretical, institutional and development dilemma. Theoretical dilemma leads to the lack of local perspective in the study of Global South issues, and the legitimacy of collective rise is difficult to be recognized. The institutional dilemma leads to the weakn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power of the Global South, while it is difficult to effectively exert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The development dilemma leads to the low-end lock-in of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and value chain of Global South, while it is difficult to fully activate its development potential. The Western myth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an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fficulties at the practical level a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and deepening of the dilemma of the collective rise of Global South. As a member of the Global South, China has both the willingness and the ability to help the Global South overcome the corresponding dilemma. In theory, the international symbiosis theory of the Chinese school helps to break the Western myth that emphasizes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strengthen the legitimacy of the collective rise of Global South, and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equal and orderly multipolar world. In practic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institutional power of the Global South, and fully activa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South, helping the Global South to achieve strategic autonomy in development, enhance its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and equally enjoy the fruits of development. Certainl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symbiosis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the collectiv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and deep integration still needs to be continuously polished and improved in practice.

Key words: Global South; 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rise; international symbiosis theory;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